

银川文史

资料

第十七辑



银川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银川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银川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2008年12月

银川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银川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宁夏九色鹿彩色印刷分公司

880×1230 大32开 11印张 18万字

2008年12月第一版 200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600册

目 录

| | | |
|------------------|-------|--------|
| 加强“三亲”史料征集工作刻不容缓 | 卞晋平 | 1 |
| | | |
| 周恩来与吴忠马夫的友谊 | 李云桥 | 7 |
| 我所知道的马青年同志 | 李云桥 | 11 |
| 回族英雄马骏 | 唐志军 | 18 |
| 陈育宁情注银川六年行 | 张晓博 | 22 |
| 从上银行学校到在银行工作 | 徐德明 | 28 |
| 我的民族工作生涯 | 马迎洲 | 51 |
| 回顾在宁大工作期间的几个片断 | 周维 | 71 |
| 军人本色沈克尼 | 罗进贵 | 77 |
| 梅香正浓 | 刘奇民 | 82 |
| “傻人”李范文 | 杜峻晓 | 87 |
| | | |
| 探寻宁夏移民的足迹 | 平原 张宜 | 蒋宏宇 94 |
| 北师大支宁来的张德澄教授 | 木禾 | 115 |
| 我的宁夏情 | 张理泉 | 122 |
| 大光明理发店往事 | 唐志军 | 126 |
| 王成玉、马贵龄一对科研迷夫妇 | 张宜 | 129 |
| 陈君健来宁支教的人生片断 | 曹海英 | 134 |

| | | |
|-----------------|-----|-----|
| 支宁报人边廷华 | 朱以林 | 140 |
| 支宁而来的康乐木器厂 | 何满群 | 145 |
| 京星农场的北京人 | 唐志军 | 152 |
| 喜事记忆 | 郭玉琳 | 157 |
| 第一声台号 | 彭玉真 | 160 |
| 我要做播音员 | 肖 鸣 | 165 |
| | | |
| 银川昔日的“五亩之宅” | 杨应林 | 169 |
| 腾格尔的宁夏情与缘 | 叶光彩 | 171 |
| 港商钟惠明在宁夏的慈善行 | 唐荣尧 | 178 |
| 科普人生 | 安 涛 | 182 |
| 当年的宁夏卍字会 | 陈光聪 | 185 |
| 宁夏卍慈小学和张楫若校长 | 陈光聪 | 190 |
| 马鸿逵的功德碑哪里去了 | 杨应林 | 195 |
| 回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经过 | 贾春光 | 199 |
| 回忆银川工业系统的技术革新活动 | 李福恒 | 204 |
| 宁夏大学土地变迁随笔 | 张 奎 | 207 |
| 三年困难时期关于吃的故事 | 王庆同 | 233 |
| 自治区成立前后的三次体育盛会 | 雷天寿 | 237 |
| 北民大贺兰山岩画调查记 | 李祥石 | 241 |
| “困难时期”的宁夏大学 | 蒋振邦 | 247 |

| | |
|---------------|---------|
| 昝元鼐其人其事 | 昝田生 267 |
| 我所知道的红旗服装厂 | 牛继宁 271 |
| 晋商称霸宁夏商场二百年概述 | 刘继云 274 |
| 封面油画 哈吉大妈（局部） | 李 宪 |

加强“三亲”史料征集工作刻不容缓

•卞晋平•

去年参加在河南焦作举行的政协文史工作协作会议（2006年10月25日至30日，全国暨地方政协文史工作研讨会在河南省焦作市举行。——编者注），我听到与会同志议论最多的话题是文史工作“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引起我对此问题的思考并作了一些调研。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倡导和培育起来的、最富有政协特色和统战特色的一项工作，曾经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近十几年来，各级政协文史委的同志为振兴文史工作积极探索，开展协作，征集和出版了不少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但是，从总体上看，当前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面临的问题不少，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有人讲得很严重，说它正徘徊于兴废存亡的关口。

这话说得很尖锐，但从一定角度上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文史工作中有些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政协文史工作在经历数十年辉煌之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巨大落差。随着第一代、第二代文史工作者的离退休，对文史工作不了解、不理解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头脑中的一些疑虑没有得到及时解答和消除。比如，对于政协文史工作的意义、作用问题，有人质疑：我们党有党史，国有国史，各地还有地方志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协的文史工作有什么意义，它的必要性、重要性在哪里？再比如，周总理之所以要倡导开展文史工作，是针对当年那一批特定历史人物因人设事，还是有着长远的考虑？换言之，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项临时性工作，还是应当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它只是一项特定时期的临时性工作，到今天它寿终正寝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它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长期任务，现在要研究的就是如何促进它的发展而不是存废的问题。有位领导人曾经讲过，当年有人提出要取消文史工作，但领导上仍然坚持保留了。他认为，这项工作很重要，很有特色，不能取消。他说，正因为文史资料是不同的人从不同方面来写的，所以对认识历史很有价值，对现实也有借鉴作用。文史工作从历经近半个世纪的辉煌到现在被人议论是该保留还是该取消，这个落差很大。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毋庸讳言，就是我们做具体工作的部门对文史工作研究不够，宣传不够，没能及时回答好新形势下遇到的新问题。所以，说现在文史工作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先要从自己身上进行检讨。如果我们连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都研究不够或者宣传不够，不能让别人理解和明白，就不能抱怨别人不重视、不支持了。因此，文史工作要振兴，首先是文史工作者要提高认识、振奋精神。

其二，当前文史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经常性的文史资料

征集工作已经基本停滞。据了解，统战、政协系统知名人士的自然来稿已经多年没有了，过去在党政干部和文史哲领域中很有影响的《文史资料选辑》多年来也已很少出版了。更重要的是，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章程规定的各级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项任务同各界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都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但这项任务、这个关系已被许多人淡忘了。包括近些年来新到文史部门工作的同志中，经常性地进行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意识也逐渐淡薄了。这是比物质条件方面不足更令人担忧的问题。

其三，几十年来，各级政协共同培育了一支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文史工作队伍，普遍建立了上下左右组织间经常进行业务协作的文史工作机构。这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支撑和骨干。但是，目前这支队伍受各方面影响较大，整体状况不容乐观。一是有些地方政协的领导同志对文史资料工作不关心、不注意，对文史工作机构的设置与撤销比较随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基本上没有检查指导，没有表扬批评，致使文史工作处在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二是一些地方政协的文史工作人员思想上比较渺茫，不知道下一届这项工作、这个机构是不是还存在，因而影响了队伍的稳定。三是工作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在机构改革中，文史工作机构有的被划为行政序列，有的被列入事业编制，有的被并入其他部门；经费上有的全额拨款，有的差额补贴，有的自收自支，各地的做法不统一。

文史工作的现状，引起了一些老同志的关注。全国政协一位已经离休的老领导曾郑重地嘱咐我，要我认真抓好文史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能有机会为国家做点事不容易，应该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周恩来同志给我们开创的这项重要工作不能在我们手里搞丢了。如果我们不能把建国后各界代表人士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史料留下来，就会给那些心存偏见甚至敌视我们社会制度的人留下可乘之机。我们的党史、国史、地方志都很

重要、很有意义，但各党派、各团体、各界别代表人物“三亲”史料的特殊作用是不能低估、不可替代的。他的这段话使我很受教育，也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想，当年周总理提出这项工作，决不只是为了使那几个人有饭吃、有事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要通过各方面代表人物撰写文史资料的方式，以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来见证历史并给后人留下真实可信的史料。所以，倡议开展文史工作本身即反映了老一代革命家的深谋远虑。人民政协的文史工作是一项记录过去、服务当代、面向未来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延伸的长期战略任务，而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活动，则是文史资料取之不尽的实践源泉。在人民政协文史工作的长河中，我们这些人只是在先后传承的接力赛中跑了一棒。我们只能把这一棒跑好而不能跑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个事业搞小了、搞没了。

当前，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都在认真总结经验，为换届工作作准备。这就为我们解决文史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我们要通过总结经验、研究政策、完善机制，争取为下一届政协的文史工作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为下一届政协的文史工作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此，我建议要加强研究、解决这方面突出的问题。比如：

(一)关于新形势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定位和重要意义。要研究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明确文史资料同党史、国史、地方志等的不同，选好角度，突出特色，加大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必要性、重要性的宣传力度。有的同志讲，政协文史资料的最大特点是“三亲”，这种“三亲”史料对于史书具有“辅正、补缺、匡谬”的作用。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

(二)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进一步推进的方向。过去提出文史资料征集工作重点向建国后转移是正确的、及时的，但也有因为表

述过于笼统而使许多人不理解的问题，主要是没有与其他方面从事的建国后历史研究明确区别开来。我觉得，这个提法似应进一步具体化，比如可不可以把“向建国后转移”调整为“向建国后政协、统战人士的‘三亲’史料转移”？这样既可明确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范围，又可突出政协文史资料的特点，不与其他部门的工作内容交叉，也不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

(三)关于当前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我认为，在文史资料的“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功能中，存史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征集到资料使之存入史册不致流失，才有可能发挥它的其他社会效益。征集工作上不去，其他的作用都无从谈起。而在征集工作中，对建国后重大事件、重点人物的史料抢救应当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为什么提出“抢救”这个词？因为历史人物是比历史文物更为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财富，必须想方设法趁他们健在时把珍贵的历史资料留下来。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参与重大决策的人物如今依然健在的已不多了，就连改革开放初期参与重大决策、重要事项的人也走了不少。比如，三峡工程是我国重大建设项目中较好地体现了民主决策的范例之一。当年，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以及相当数量的政协委员，为推动这项工程的科学论证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他们留下来的有关这一段历史的“三亲”史料并不多。全国政协委员中曾经参与和见证了这段历史的一些知名代表人士(如孙越崎、周培源、林华、马大猷等)大多已经过世。再比如，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并见证了这段历史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安子介副主席、霍英东副主席、王宽诚先生、何贤先生、庄世平先生等)都已先后去世。因此，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对于做好文史资料的征集和抢救工作，一定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四)关于探索和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史料征集工作的机制。现

在，我们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与过去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不尽相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使经常性的征集工作能够持续开展下去，就必须从思路上与时俱进，在方法上、机制上有所调整与创新。比如，要继续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对各界政协委员和统战人士进行思想动员。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体现利益原则，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对所征集的史料给予相应的报酬；要改变过去单一依靠征集纸质史料的做法，尽可能地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实现录音、录像和笔录多种征集形式并举，提高史料征集工作的效率；要研究和借鉴国内外搞口述史料的经验，采用政协文史工作部门选题策划、审核把关与借用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办法，解决文史部门编制偏紧、力量不足的问题；要有重点、有选择地组织出版文史资料，发挥文史资料的社会效益，提高文史工作的经济效益，等等。总之，政协的文史工作要立意高远，但一定要有紧迫感，具体工作必须抓紧干；政协的文史工作不能急功近利，但一定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必须从机制上形成可以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本文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卞晋平同志在2007年召开的15个副省级城市政协主席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原载《中国政协》2007年第7期。本辑转载时对个别地方作了技术性处理。)

周恩来与吴忠马夫的友谊

•李云桥•

1985年的春天，我在同心下乡工作时，去了同心烈士陵园，在红军烈士墓碑前我献上了一束鲜花。曾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老红军马青年，深情地对我说：“可惜你们的老乡胡天佑没有在这里度过他晚年的岁月啊！上次来宁夏的山西人大代表谈到胡天佑的故事你还记得吧？”我立即回答：“记得，记得，胡天佑是吴忠人，是周总理的马夫、勤务员，这个老乡我怎么会忘掉呢？”回到同心县招待所，马青年又告诉我说：“胡天佑是位老红军，曾在红军回民独立师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我是师长。他是宁夏人，我在工作上靠他帮助的地方很多，联系群众是他的长处。红军西征在攻打韦州、同心时，他喊话对敌军攻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的吴忠话和同心话一样，喊的话对方一听就明白。

当时，回民独立师政委欧阳武和红十五军团刘华清都向敌军喊话，因是南方人，喊话口音对方听不懂，胡天佑一喊话，就可以对话了。胡天佑作战也很勇敢，冲锋上阵，不怕流血牺牲，他抡大刀片子也利索。我同胡天佑有很深的友谊，在王团庄战斗时，为了掩护我他负了伤，我很敬重他。他告诉我，他出生在吴忠堡，小时父母都去世了，由邻居江西老表把他领养长大的，后来江西老表回江西老家，就把他从吴忠领到江西了。到十几岁时，他在安源煤矿当矿工。1931年，参加了工农红军，给红军喂马当马夫，为人能吃苦，对革命忠诚。长征前夕，他调到中央警卫团给周恩来当马夫和勤务员。

“在长征中，周恩来在过雪山草地时生病了，他一边抬周恩来的担架，一边找草药为周恩来治病，邓颖超很感激他。过大渡河时，邓颖超骑的马陷在河泥中，胡天佑冒着枪林弹雨，不顾个人生死，跳入河中把邓颖超背上岸来，送到安全地带。长征到达陕北后，胡天佑一直给周恩来当马夫，周恩来和邓颖超视胡天佑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兄弟。

“在红军西征时，胡天佑向周恩来提出参加西征，要去解放自己的家乡。周恩来非常高兴，答应了他的请求。临上前方时，邓颖超还亲自给他做糖饼作为上路的口粮。胡天佑很感激，因为这是恩来首长舍不得吃的糖留下给他做饼子了。”

1984年山西来宁夏的同志告诉我，山西吉县水洞沟的山塬上有一个墓碑，上面刻着：老红军胡天佑之墓。墓碑上刻写着胡天佑的生平事迹。碑文记载，胡天佑是宁夏吴忠人，在井冈山和长征到陕北时一直是周恩来的马夫、勤务员。西征胜利结束后，他回到延安警卫团。

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时，党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要大转移，胡天佑生病不便行动，由部队组织把胡天佑送过黄河，安置在山西吉县南村养病。胡天佑在南村靠群众帮助身体渐渐恢复，

他视群众为再生父母，经常和老乡一起下田劳动，和乡亲们打成一片，村里人都叫他胡哥，他也成为南村的村民了。

7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下乡工作队得知胡天佑的身世，立即报告了部队和当地政府，经山西省报告了国务院，因此前周总理曾多方托人寻找胡天佑的下落，一直没有找到。当周恩来得知胡天佑在吉县后，立即请山西吉县政府转告胡天佑，要他到北京看看。1971年9月，胡天佑在吉县南村党支部书记郭国娃的陪同下，应周总理的邀请到了北京，住在国务院招待所，部队的老领导、老战友都去看望他，问寒问暖。

国庆节前夕，胡天佑应周总理的邀请被接到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专等在门口，看见胡天佑走出车，连忙上前握手说：“天佑同志，这就是我和恩来的家，今天恩来和我专门请您来家做客。”边说边拉着胡天佑的手进入西花厅。周恩来高兴地从里屋出来紧紧握着胡天佑的手说：天佑同志啊，多年不见了，好想您哟，你可来北京了啊！胡天佑也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说：“我也想总理，想邓大姐呀！还惦记着我呀！”胡天佑这时热泪流个不停，再也说不出话来。周总理赶忙拉着胡天佑的手让他坐下，深情地说：“多年不见，你、我都老了，身体还好吧？”

接着周恩来和邓颖超又问胡天佑成家了没有？生活过得怎样，有啥困难？周恩来总理关心地问吉县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胡天佑都一一作了汇报。周总理说：“你来得好，让我知道农村的实际情况，回去代我向乡亲们问好。我总以为你回宁夏吴忠落户了，想不到你还在山西。”胡天佑说：“在山西吉县我住惯了，南村的乡亲们待我如一家人，很好啊，我也舍不得离开他们，就一直住下来了。”周总理高兴地说：“天佑，你想得好啊，在新中国，哪里都是自己的家乡啊！”周总理和邓颖超当天在家里请胡天佑吃晚饭，边吃边谈了许多话。

当胡天佑离开北京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嘱咐胡天佑要注意

身体，有什么困难写信告知。邓大姐还送给胡天佑200元钱作家用，又送了些衣服、茶叶、纸烟和防感冒药。邓大姐亲切地对胡天佑说：“以后每月我给你寄生活费，回去以后不要增加政府的困难，有事找我吧！”胡天佑回吉县后，从没有找政府要求解决困难。他每月都收到邓大姐由北京寄去的汇款。1975年，胡天佑生病期间，邓大姐几次汇款，要他好好治病。胡天佑去世，周总理得知后，委托总理办公室发去唁电说：“总理对胡天佑同志病逝表示哀悼，丧事从简为宜。”

这些珍贵的史实，反映了开国总理周恩来与一个红军马夫的真诚友谊，这是人间真情。胡天佑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我为宁夏家乡出了这样一个优秀的红军战士而自豪而骄傲。

我所知道的马青年同志

•李云桥•

马青年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回族领导干部，他18岁当红军第一个回族师长，筹建国第一个回族自治县，32岁当地委书记，40多岁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八十年代在宁夏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参加过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红军西征，参加百万雄师渡江到湖南工作。他是陕西安康县人，根在三秦大地、黄土高坡。他幼年时家境贫寒，流浪到六盘山区，是西海固地区和同心县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哺育他成长。他曾说，他的根也在宁夏，他的魂永系宁夏。因此，党中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调他来宁夏工作，是有缘由的。

红军第一个回民师长

“若要等到红军来，六盘山上哟鲜花